

#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01号

责任技编：陈垂涛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125印张 270,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7—218—00948—4/K·217

定价7.80元

## 《石辟澜》序

秦牧

本书是纪念卓越的革命战士石辟澜同志的专集。它包括烈士的许多遗作，还有战友、故人、亲属缅怀他，悼念他的一系列文章。

石辟澜同志活在千万群众和同志们心中。大家的心窝上，有一座怀念他的丰碑。本书，正是这座丰碑的反映。

石辟澜是1947年从延安出发，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创建新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到现在已经45年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人们不断在缅怀他，悼念他。纪念文章经常出现在各种报刊上。本书是经过好几位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的建议，得到广东一大批同志的赞同，从而筹划出版的。这段时间跨度很大，它说明石辟澜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是何等强烈，人们对烈士的怀念之情是怎样的深沉。

石辟澜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老同志固然普遍认识他，抗战前夕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抗战初期在香港、广州、韶关从事抗敌工作的同志们更是广泛知道他。因为他曾任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和总干事，又曾经当过在粤北风行一时的《新华南》杂志的负责人，后来又出任过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

长。围绕着这些职务，他进行了一系列非常出色的工作，往往留给人们的深刻的印象。

石辟澜是人民的忠诚儿子。他除了积极为革命工作，做出贡献外，还具有多方面的美德。他一贯辛勤学习，尽管少年时代所受正规教育甚少，甚至还做过补鞋匠，但他依靠锲而不舍的自学精神，不仅能够考进夜大学，而且还逐渐成为出色的政论家。他常在救亡日报发表文章，犀利的笔锋，深刻的见解，曾经倾倒南国许多读者，上海救国会有些时局宣言，就出自他的手笔。他热情似火而又冷静如铁。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他曾多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且撕下衬衫写下哀词和誓言。他曾被法租界巡捕抓去，但却机警地相机逃脱。为了深入下层，在广州他曾到“二厘馆”（手车夫们的憩息之所）和最劳苦的群众一同生活。他对工作是如火如荼，英勇顽强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朋友、家人的周密关心和细微照拂。他在辗转流离中所写的家书，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对自己无意与之结合的名义上的未婚妻，仍千方百计设法让她出来，使她能够进行学习和独立生活。石辟澜是一个如古语所形容的“剑胆琴心”的人，夏衍同志的题词称许他“正直刚毅，无畏无私，舍己为人，死而后已”。虽仅寥寥十六字，但的确写照传精，道出了石辟澜这样的热血男儿，革命志士的英雄本色。

我是1939年在韶关认识石辟澜的。在当时文协的集会中，晤谈几次之后，我们即成好友。订交之后，更是时有往来。石辟澜是我青年时代的良师益友之一。那年冬季我们握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算起来，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了。他1947年在湖北麻城被地方武装杀害，从壮烈牺牲到现在，也已经有45年了。但是此刻，当我执笔撰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仍觉得他的音容笑貌，动静语默，宛然如生。唯其像石辟澜这类人物的品格风范，学识贡

献，赤胆丹心，是感人至深的，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印象。在这里，让我遥向湖北麻城任家湾一家岗的烈士丰碑，再度俯首默哀，并和大家一道表达我的敬意和怀念吧！

1992年初·广州

我所讲的“文革”时期高校对中学生的控制权，即所谓“三权”，是“文革”期间高校行政、教学、学术三权分离的倒置，是“文革”期间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现象。在“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是“文革”的主要特征之一。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把高等学校分为“革命大学校”和“反动学校”，“革命大学校”就是指那些由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直接领导或支持的高校，如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目吴晗就曾公开表示：“清华是革命大学校”。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

我所讲的“文革”时期高校对中学生的控制权，即所谓“三权”，是“文革”期间高校行政、教学、学术三权分离的倒置，是“文革”期间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现象。“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是“文革”的主要特征之一。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当时的高等学校行政领导，如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都是“文革”初期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教学和学术权力之上的主要推手。

## 目 录

《石辟澜》序 ..... 秦牧 (1)

### 回 忆 录

参加革命运动的回忆 ..... 柯 麟 (1)

我所经历的革命斗争 ..... 连 贯 (20)

在珠江三角洲的日子里 ..... 曾 生 (39)

#### ——守卫和建设祖国南大门

回忆广韶公路南线的几次战斗 ..... 邓楚白 何俊才 (58)

粤北省委被破坏后掩护部分领导同志的回忆 ..... 刘俊英 (70)

粤东之春 (下) ..... 铁 坚 (83)

回忆中国歌舞剧艺社海外三年 ..... 丁 波 (110)

### 党史专题

民主党派在华南的革命斗争与中共领导的

多党合作制的形成 ..... 郑泽隆 (123)

琼崖特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 ..... 吴基林 (134)

后东特委在龙川 ..... 黄 义 (146)

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 (上) ..... 袁小伦 (159)

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发展起来的粤赣湘边纵队 ..... 何焕昌 (206)

### 党史人物

“革命母亲”李梨英 ..... 李习楷 (221)

陈唯实传略 ..... 熊泽初 (231)

许美勋与潮汕早期新文学运动 ..... 陈汉初 (242)

- 尚仲衣与抗战教育 ..... 洪流 陈金葵 刘寒 (248)  
上饶集中营两次暴动中的广东战士 ..... 卢权 徐建中 (258)

### 大事记

-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事 ..... 广东省档案馆 (287)

### 革命报刊介绍

- 省港大罢工的喉舌——《工人之路特号》 ..... 洪 霆 (333)  
广东抗战报刊简介 ..... 官丽珍 (342)  
《北江报》琐记 ..... 陈汉华等 (360)  
中共潮汕地委创办的党报——《团结报》 ..... 黄仲斐 (364)

### 问题考证

-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正义报”释文  
的订正意见 ..... 杜先列 (371)  
团雷州特委若干问题之我见 ..... 张 翊 (373)

### 附录

- (191) 会议记录

- (191) 林基长

- (191) 陈

- (191) 分

- (191) 会议记录

- (191) 教育系

- (191) 政策

- (191) 经济学

### 附录

- (191) 教育系

- (191) 政策

- (191) 经济学

## 参加革命运动的回忆

柯 麟

1920年正是帝国主义各国剧烈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当时设在广州的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及它的前身广东公医专门学校，就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而通过它的走狗创办起来的一间高等医科学校。当时把持学校的是一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赵秀石和董事潘佩瑜是广州有名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行会、善堂的把头，他们与军阀官僚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谄媚外国主子。校长是曾在英国爱登堡大学得过所谓“医学博士”学位的李树芬，他在香港挂牌行医刮了钱，又以“办学”为名，到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去向华侨募捐。在美国时曾与美垄断资本家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勾结，回国后极力实施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教育。帝国主义分子英国传教士郭守道和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传教士达保罗两人实际上操纵着广东公医医科大学的大权。

广东公医医科大学与当时的岭南大学一样，在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把持下，力求洋化和贵族化，学费、宿费、书籍、伙食费都收得很高。规定西装为学生的制服，要学生信仰基督教，读圣经，守礼拜。学校的教学制度和师生的生活方式，极力模仿

英美。这样的洋化贵族学校，家境贫穷的青年是难以入学的，有学生入学后，因家庭经济无法支持昂贵的学习费用，不得不中途转学；有些学生因不满奴化教育和“不遵守基督教的教规”而遭到斥令退学或降级。学校主持人还以所谓严格考试的手段来“淘汰”不甘奴化的学生，又以保送留学英美的手段来引诱意志薄弱的青年。由于以上种种缘故，原来一班有几十个学生的，到毕业时就只剩下十几个或几个人了。全校在学学生总数只有100多人。

1920年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这一个运动的巨大影响。那一年，陈独秀在广东教育委员会担任委员长的职务。当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还有一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极力提倡平民教育，并向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群众传播马克思学说，反对中国的旧伦理道德和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道理。他们利用教育行政的权力，展开公开合法的斗争，命令各私立学校增设公费名额，并进行了部分学校的调整和整顿，勒令各贵族学校向平民开门。广东公医医科大学为敷衍命令，不得不勉强在1920年起每年招收公费学生5名。我就是这一年以公费生资格考入该校读书的。记得当年公费生考试是由广东教育委员会主持的，国文试题是“外国人在中国各地办学校，办医院其目的何在？”当时参加公费生考试的共100多人，被录取的5人的国文答案都是力斥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是文化侵略。当然，这些人都不是学校所希望取录的学生，取录权不在学校而在教育委员会，它也无可奈何，而此例一开，以后每年就不得不循例招收公费生了。

1923年秋，李树芬从美国向华侨“募捐”回来，厚颜无耻的到处扬言：已得美国煤油大王同意，由美国洛氏教育基金会来接办医科大学，保送“优秀毕业生”去美国留学等等。这引起了大多数

有热血的爱国青年学生和不愿当亡国奴的教职员的愤慨，有些教师不和李树芬同流合污，愤然离校他去，而那些少数的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走卒的洋奴则更加拼命的巴结达保罗和李树芬。其中有一个名叫邓真德的洋奴，从小就由美国传教士夏查理养大，认夏查理为“契爷”（干爹）；捧洋人的大腿，作威作福。原来他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广州开业医生，为了要利用医科大学教授的招牌来抬高身价，藉以招生意，于是借夏查理的势力混进了医科大学，当上了“教授”，讲授1926年班的“实验诊断学”（即内科基础）。他平时既不备课，也不带讲义上堂；上课时就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越讲越糊涂，因而引起1926年班全体同学的愤怒。在春天开学时候，全体同学便联名警告邓真德，提出应停授“实验诊断学”改讲别的课目，以免误己害人。邓真德收到同学的联名信后，恼羞成怒，自以为有美国干爹夏查理撑腰，学生无奈他何，把信交给李树芬，大骂学生“造反”。李树芬也认为“此风不可长”，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立即出布告，声言要把1926年班全体学生开除学籍；另方面又采取欺骗收买手段，声明“凡真诚知过”愿向学校填具悔过书者得恢复学籍，否则限即离校不得逗留，以肃校规而正校风”云云。

李树芬这个做法，是处心积虑的。因为当时他与达保罗、郭守道、郭守德等英美籍教士开会，密锣紧鼓地进行出卖学校的勾当，十分害怕学生起来反对他，破坏快将成交的生意；而且连年以来，他向华侨欺骗了不少资金，附属医院的收入和大学学费、杂费的收入颇巨。但从未公开过财政收入，黑幕重重，十分担心学生由此而干预校政，有碍其营私舞弊行为。更重要的，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了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和全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

理人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有共产党人出席并参加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成了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广东的革命运动正在逐渐高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正在向前发展，到处响彻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党的外围组织广东新学生社的活动很活跃，常常鼓动学生参加校务会议，要求学校财政公开，要求学生有择师和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此李树芬他们十分害怕革命的风暴传入该校难以收拾。由于以上种种考虑，他们便立下狠心，借驱逐邓真德事件，来镇压学生开除学生，企图阻止学生运动的发展。他们以为1926年班接近毕业，全班只有15人，只要采取开除学籍和准许悔过恢复学籍的威逼利诱的手段，就可以太平无事、高枕无忧了。可是，反动派的算盘打错了，学校的布告张贴出去以后，1926年班的同学们，不仅不“悔过”，而且更加愤怒，更加坚决地斗争起来了。全班同学立即开会决定，坚决与学校无理专横的措施进行斗争到底。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决不离开学校，他们实行罢课，发表宣言进行抗议，呼吁社会各界援助。他们派出代表与全市各中上学校学生会联络和本校各班同学联络，请他们援助。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全校同学的支持，立即停止听课，选派代表质问李树芬，要他解聘邓真德，收回开除学生的布告，并对他们无理专横的行动表示愤慨。市内中上学校的学生会和新学生社也纷纷派代表来校慰问，同情与支持1926年班同学驱逐邓真德的正义行为，并向李树芬抗议。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洋奴们的意料，他们屎出尿流，羞怒交加，竟将一位曾指出他们开除学生学籍的布告是“荒谬绝伦，天下所无”的姓黄的同学，加以藐视学校校规，扰乱教学秩序的“罪名”，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

李树芬之流镇压学生的行为，不仅不能制止别班同学对1926

年班的同情支助，反而激起了全校同学的公愤。于是，全校同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广州市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实行全校大罢课，向学校当局提出三项要求：1. 解聘邓真德；2. 恢复1926年班全体同学学籍，取消对姓黄的同学的记大过的无理处分；3. 学生会代表应列席校务会议，学校财政必须公开等。当时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派了阮啸仙、杨石魂、周文雍、刘尔崧等同志来领导和帮助我们进行斗争，使我们斗争得到顺利的开展。我们加强了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全校同学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坚定地提出：“不妥协、不动摇、不离校”的口号，从3月初开始罢课一直坚持了2个月。到5月间，李树芬眼看暑假将到，便阴谋准备提前放暑假，以拆散同学的团结。当时高年级有些同学动摇，毕业同学会又来调停，他们提出了三个退一步的解决办法：1. 学校辞退邓真德；2. 被开除的同学承认过失；3. 学校收回成命，恢复1926年班全体同学学籍。毕业同学会调停的3个条件，李树芬被迫接受。当时我们也为了照顾应届毕业同学的利益和团结全校同学以便作更大更有意义的斗争，而且这一场斗争已大大打击了洋奴的威风，使全校同学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因此，最后同意了毕业同学会的调停，结束罢课。1926年班全体同学都恢复学籍，继续上课了。美国佬夏查理的“契子”（邓真德）从此再不敢在百子岗出现，美国人达保罗、英国人郭守德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和气”的脸孔来对学生，不敢像以前那样公开地扬威耀武了。这是我们斗争的初步胜利。我们学校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初次尝试了中国青年学生的铁拳。共产党也通过这场斗争，在我们学校里开始撒下了红色的种子。

全校同学经过这一场择师运动的罢课斗争以后，大部分同学觉悟有所提高，进一步认清了学校当局的重重黑暗内幕，加深了

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扼杀中国文化的仇恨。这次斗争的初胜，鼓舞了同学的革命斗志，认识了只有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坚持斗争，才能获得胜利。

大部分同学开始懂得自己的组织——学生会的重要作用，要团结全校同学的力量，就要健全学生会组织，把它掌握在进步的同学手中，同时，还要加强与校外的进步的学校的学生会联系，特别是要参加到党领导下的广州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中去。同学们深深感到过去只埋头读书，不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运动是错误的，不斗争，书也念不成，终有一天是会被赶出校门的。一些觉悟较高的同学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是我们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党的指导下，选择了自己正确的道路。有几位同学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有10多位同学参加了在共青团直接领导下的进步组织新学生社（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了共青团和新学生社）。从此广东公医医科大学的学生运动，就有了较强的核心力量，它带领着青年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胜利前进。

在那个时候，党派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如工业专门学校的周文雍、张善铭及铁路工程学校的杨石魂等同志，常到我们学校来指导和推动学生爱国运动。那时，我们整顿了学生会，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共青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副主席、秘书、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他们都得到同学们的爱戴。我们不断介绍同学阅读进步刊物，如党刊《向导》、团刊《中国青年》等。这些马列主义的刊物，成为学生群众中重要的精神粮食，他们贪婪地阅读着，从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和取得新的力量。并且我们还邀请了党的合作者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到校演讲，通过他，公开合法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这

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学生运动在广东公医医科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打下了基础。

邹鲁这个文化特务头子，他当时是广东大学的校长，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企图空手得到一个医学院作为阵地，因此，他对医科大学特别感兴趣，野心勃勃，极力主张公医归并广东大学。他提出两个并校的办法：一个是通过上届校长董事会协商来达到目的；一个是利用学生到政府、党部和广东大学请愿。当时党组织指导我们认清他的阴谋，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心中有数，待机行动。

1925年，广东的革命力量更为发展。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的爱国人民都积极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行列。6月2日广州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同胞的游行示威大会。6月10日至12日广东工农群众与革命军人全力合作，展开了肃清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反动军队的斗争。6月19日香港10多万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商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援助上海同胞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罢课、罢市。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工人又在党领导下举行反帝罢工。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接着在6月23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在广州又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革命的火把照耀着中国，也照亮了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全体学生的心。6月23日的上午，在学生会领导下，全体同学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当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以英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军陆战队，竟从沙面开枪屠杀游行的群众，造成严重的流血大惨案。可是，疯狂的屠杀吓不倒已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更激发了全省、全国人民群众

无比的愤怒，反帝运动更扩大和深入了。我们学校的同学，在这次游行中，也有10多人受伤。同学们在沙基惨案的血的事实面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亲身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亲眼看见了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兽行，促进了对帝国主义同仇敌忾的斗志，认识到中国要独立、自由、平等，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们回到学校后，真是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激昂，反帝情绪十分高涨。在新学生社和学生会的号召下，和全广州市的学生团结一起，采取一致行动，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演讲队及下乡演讲队，向市民、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对英经济绝交、封锁香港的道理，发动广大群众支援省港大罢工。而在学校内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控制学校的斗争，也继续尖锐地发展着。

这个革命形势，使得校长李树芬急得满头大汗，他在帝国主义者和买办资本家的指示下，慌忙使出毒辣的手段：一方面公开压制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不准学生罢课，命令即日上课，禁止学生组织演讲队进行反帝宣传活动；另一方面，大肆宣扬奴化思想，无耻地对同学说：“救国有人，你们手无寸铁救什么国，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企图迷惑和拉拢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可是，这一来，他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暴露无遗，更激起了全体同学的公愤。当时党分析了学校的情况和广州市的政治局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了全体新学生社社员和部分进步同学举行会议，提出了“反对奴化教育，打倒李树芬”、“收回教育权”等战斗口号，决定发动全校同学进行请愿，收回公医，并入广东大学。这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学生群众和医院部分进步人员的积极拥护，并且还得到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6月25日在全体学生大会上通过决议之后，即宣布全校罢课。这时群情汹

涌，大家高举着写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李树芬！”“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反对李树芬出卖学校教育权的阴谋！”“反对奴化教育！”“帝国主义的走狗滚出去！”“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同胞，为沙基惨案同胞复仇！”的鲜明旗帜，浩浩荡荡地昂首阔步地开到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广东大学及广东革命政府请愿。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广大群众的支持，斗争终于胜利了。当天下午即接到广东革命政府（7月1日，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正式命令：即日派李文范接收公医，并入广东大学，改称为广东大学医学院（这名称一直到1926年才改为中山大学医学院）。

这一场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阴谋破坏。当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行动计划，被一个动摇的同学向学校董事长的儿子赵某告密后，董事长赵秀石惊惶失措，马上在他家召集李树芬、达保罗和一些董事等举行紧急会议，勾结国民党右派分子，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公安局长吴铁城采用恶毒的威逼利诱手段破坏运动。6月26日，他们企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把几位领导运动的骨干扣押起来，同时企图用保送留美、留日的办法来收买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运动骨干，使他们退出运动，并且还向国民党中的有势力的人进行活动，要他们出面反对公医合并广东大学。但是，运动发展得很快，在廖仲恺的坚持下，国民政府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坚决措施，一日之内派员接管了公医，打乱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的计划。李树芬、赵秀石、达保罗等不甘失败，“顽抗到底”，继续勾结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吴铁城等和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医院秘密开会，使用登报“声明”，用所谓检举手段，歪曲事实诬蔑说：“收回公医归并广东大